

# 海洋迷思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  
《镜花缘》海洋观念的比较研究

。 唐 琰 。

**摘 要** 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和李汝珍的《镜花缘》都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外,描写了作为现实存在的海洋活动。但是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明清时期严厉的“禁海”政策,使二者都出现了海洋迷思,并且因时代不同各有特点。

**关键词**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镜花缘》 海洋迷思 比较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自古就与海洋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然而,长期形成的以大陆农业文明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格局铸就了国民以农为本、陆主海从的思维模式,使海洋在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中没有地位,更使作为现实存在的海洋活动在文学作品中少有反映。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下简称《西洋记》)和《镜花缘》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以海洋漫游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明清两朝厉行海禁的大背景下,问世于明万历年间的《西洋记》对郑和下西洋这一千古盛事做了生动描述,而两百多年后、清嘉庆年间问世的《镜花缘》也描写了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信息。二者都把目光投

向广阔的海外,其所体现出的海洋观念不仅引人注目,而且很具有代表性,通过对它们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传统海洋观对人们的影响以及一定历史时期国人海洋思想的变化,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

### 一、对外部世界的探求

从全局来看,罗懋登的《西洋记》是借演义明初郑和、王景弘等人下西洋通使三十余国的历史,表达了对海洋的关注和对外部世界的探求。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贯以天下中心之国自居,所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曰中国,居一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sup>①</sup>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断强化着封建统治者的封闭心态,也妨碍了更多的中国人去探索“化外之邦”的外部世界。

《西洋记》突破了传统的天地观念,对宇内形势做了粗线条的勾勒。第九回中张天师就向永乐皇帝指出:“天覆地载,日往月来,普天之下有四大部洲:一个是东胜神洲,一个是西牛贺洲,一个是南赡部洲,一个是北俱芦洲。陛下掌管的山河,就是南赡部洲”。<sup>②</sup>第十四回中金碧峰长老历数下西洋的路线道:“南朝去到西洋并无旱路,只有水路可通……”。上船处是下新河洋子江口,经过金山、孟河、白龙江到达大海,“舟船往南行,右手下是浙江、福建一带,左手下是日本扶桑,前面就是大琉球、小琉球。过了日本、琉球,舟船往西走,右手下是两广、云贵地方,左手下是交趾”。接着过“软水洋”、“吸铁岭”,“软水洋以南,还是南赡部洲,软水洋以西去,却是西牛贺洲了,就却叫做西洋国。西洋是个总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国是一国……”。<sup>③</sup>这些叙述在地理概念上还有一些混淆不明,但对四大部洲的解释和有关沿海地理的详细描绘,已不能不说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一种进步。

此外,《西洋记》对郑和下西洋沿途所经过国家和地区的海路航程、种族物产、风土人情,以及经济、政治制度等情况作了详细记述,尽管这大多参考了随郑和出使的马欢等人留下的著作,但我们知道,此书写作时距1433年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已经160多年,其间明政府的海洋政策日趋保守,成化朝时更为了杜绝后代帝王兴起

经略海洋的念头，连在兵部库存的郑和航海档案资料也一并销毁，“以拔其根”<sup>①</sup>，而罗懋登能不遗余力搜集民间传说，并在作品中容纳相关材料再现那幅波澜壮阔的远洋画卷，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勇气和能力，集中体现了他认同海外探险、渴望了解异域和异物的思想。

郑和下西洋，原是人间的活动，《西洋记》中却增添进一些新编的神话：西洋各国魔怪丛生，佛与人结合的金碧峰成为一路上降魔除妖、乘风破浪的主要英雄，作用远在郑和、王景弘之上……这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和科学知识的贫乏，郑和航海过程的种种惊险、传奇的经历经过民间的流传，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另外，明代后期，国势日衰，外患频仍，在作者心目中，要完成类似郑和那样威震海表的事业，单凭人力已属不可能了，因此小说中海外漫游的神魔化描写实际上还沉积着他能对英雄横空出世扬威海上的无限期盼。

相比之下，李汝珍的《镜花缘》幻想色彩更加浓重。小说第一部分写唐敖、林之洋等人去海外经商，经过了几十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名称，大都依据《山海经》的记载。然而，《山海经》作为古代一部神话书，里面充满了千百年前人们对世界的幻想，记载文字却十分简略，《镜花缘》只是借它作个引子，加以夸张描写。例如，关于“君子国”，《山海经》的《海外东经》和《大荒东经》都只有寥寥数语，《镜花缘》就采取其中“其人好让不争”一句写成了一个“礼乐之邦”的国家，在那里，“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也不愧‘君子’二字”<sup>②</sup>；“女儿国”国名的原始根据虽然也出自《山海经》，内容却完全是重新创造，想象有那么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从事生产，女子的智慧才能都无异于男子。不难看出，这里所描写的君子国、女儿国，还有其它如黑齿国、白民国、淑土国、两面国、犬封国和无肠国等，尽管都是根据古书的记载，主要却是作者在运用自己的想象，针对当时社会上他所认识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发抒自己的改革意见，而对海洋开放性和海外探险的认同正是支持这种写作的基础。至于聂耳国、玄股国、不死国、三首国这些国家，李汝珍或是写人们形体的奇异，或是写人们特有的才学技能，或是写地方风土的特点，或是写地方特有

的古迹文物,更直接表现出他极力扩张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国之外发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们愿望。

诚然,在当时人们的海洋实践活动已经相当丰富的情况下,《镜花缘》还热衷于对“海中三神山”、入海求仙的描写,不免令人遗憾。但清代前期严厉的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呈相对封闭状态,因此从具体历史现实来考察,李汝珍能将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积极探求未知的外部世界还是有其了不起之处。

## 二、对待海外贸易和华侨的态度

浩瀚的大海虽能从地理上把各国隔开,但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的提高,海洋这个开放的世界,实际上又成为无远不至的通途,促使人们努力去谋求海外发展,其中,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拓殖是两种最主要的方式。

海外贸易在《西洋记》中涉及很少,却足以反映作者的思想。小说叙写郑和等奉使出洋,历经七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始终没有进行什么商业活动,随船带回的一些西洋各国进贡的“宝物”,或是海外奇珍,或是香料土产,都不能为国家增殖财富。这种“开海远航”,只是一种官方经营海洋的活动,主要是利用“朝贡”关系作为羁縻海外国家的手段,提升中原王朝的政治威望,其政治性目的远远凌驾于经济性目的之上。对此,罗懋登在《自序》中感叹“贡琛之盛,前此未闻”,“开辟之主,贵在宣威”,<sup>⑥</sup>又在书中借永乐皇帝之口说:“此行……皇风宣畅四夷,夷而慕华,莫之大益”<sup>⑦</sup>,直接阐发了自己的肯定与钦慕之情。另一方面,小说中罗斛国的谢文彬、淳淋国的陈祖义原本都是明朝的海商,流寓海外,在作者笔下,他们生性奸诈,勇悍无耻,蓄意挑拨别国与明朝的关系,郑和斥其“私通外国”、“亡命之徒”,并最终击溃谢文彬,将陈祖义枭首示众。这充分表明,由于传统重陆轻海、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政府“禁海”政策的导向下,罗懋登认同追求“宣德化而柔远人”政治效果的官方朝贡贸易,对于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民间海上贸易活动是持鄙视和贬斥态度的。

也正是出于这种观念,尽管《西洋记》不免对东南亚一带华侨足迹

遍布各处的情况有所记载：“新村……原系沙滩之地。有中国人来此居住，遂成村落。”“杜板……约有千余家，其间多有我南朝广东以及漳州人，流落在此，居住成家。”<sup>⑧</sup>……作者却没能继续深入描写华侨的生活，更没有就华侨对这些地区的历史贡献作出客观评价，而是大肆渲染郑和清剿谢文彬、陈祖义等的军事行动，将其作为明廷镇抚海外流民的一项“盛举”，并由此发出了“海道一清”的由衷赞叹。

关于海外贸易和华侨问题，李汝珍的思想是罗懋登无法媲美的。《镜花缘》中海外经商的三个人物，一是唐敖，出身于书香世家，岁岁应试，年年青衫，好不容易中了个探花，又被人告发，仍为秀才，于是幡然悔悟，弃儒经商；一是林之洋，年轻时也追求过功名，但他早就体验过秀才年年应试不中的痛苦，更视岁考为“活地狱”，于是弃学从商，成为周游列国的经济人；一是多九公，幼年曾求过学、应过试，感到科举难中，便脱了儒巾，出海经商，成为经验丰富的商船舵手。他们都是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君子不言利”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由儒生直下而为社会“末业”，更冲破了海禁成为海商的。作者通过塑造这类全新的人物形象，抨击了清朝统治者“强本抑末”、“闭关自守”的政策，表现出对民间海外贸易较为积极的态度。

事实上，李汝珍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随做官的哥哥李如璜从直隶大兴移居到古海州的板浦，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李如璜是盐官，板浦是淮北三大盐运内港码头之一，盐商云集，许多富商家中为了盐运，养有海船，而李汝珍因其舅兄“二许”（淮北名士许乔林、许桂林）家中也有海船，曾不止一次地随船出海飘洋，感受海上贸易气氛。这些都使他有机会了解一些海商经营的情况，并在《镜花缘》中对此作出生动描述：唐敖出海前买了许多花盆和几担生铁，众人都认为是滞销货，难以出脱。可到了女儿国，唐敖帮助当地人治水时，因这里向来铜铁甚少，为了赶制挑河工具，他运来的生铁成了紧缺物资，全都卖光了。至于花盆，到了长人国，因可以作为长人们的鼻烟壶，竟和平日喝酒剩下的空坛一起被重价买去。小说第十二回，君子国送给水手们燕窝，水手们品尝珍贵的燕窝并不比粉条子好吃，便以粉条子的价钱卖给了船主

林之洋，带回国后，却成了筵席上昂贵的珍馐，让林之洋发了一笔横财。这些描写，当然颇有夸张、想象之处，但说明作者能够正视人们为了发财致富而出海冒险这一社会现象的存在，并已充分认识到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以及其中蕴含的种种偶然性。小说第二十回至卅二回则系统地描绘了商船周游列国时，面向市场，掌握信息，根据需要，供应货物的情形：淑士国的读书人多，就以货卖纸墨笔砚为主；巫咸国人不识蚕桑之技，就以货卖绫罗绸缎为主；歧舌国爱好音乐的人多，就以货卖笙箫管笛为主；女儿国的男女都爱打扮，就以货卖胭脂施粉为主……在女儿国，林之洋还说道：“海外卖货，怎肯预先开价，须看他缺了那样，俺就那样贵，临时见景生情，却是俺们飘洋讨巧处。”<sup>⑨</sup>……正是出于对海外贸易的合理性及其规律的一定认知，作者才能够这样形象地描绘出种种交易的场景，乃至点明海外行商的关键所在。但是，另一方面，文学是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的，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受到封建主义经济的强大束缚，作者的思想也不可能超越时代而独立，因此，书中所写的海外贸易只能是一种不成熟的贸易，林之洋他们在海外经商，行期不定，地点不定，所带的货物又都是一些耐用品，如丝绸、陶瓷、铁器之类，他们对市场需求更多的是凭经验办事，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国家，完全只能碰运气了<sup>⑩</sup>。

华侨现象在《镜花缘》中也得到了较为客观的反映。书中的几个华侨，他们侨居国外的原因各异，有的是为了避战乱，如廉景枫一家；有的是为了避时祸，如尹元、薛蘅香等人。作者不仅写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况，而且写出了他们对于当地社会的贡献和海外创业的不易。薛蘅香和姚芷馨在巫咸国传播先进的桑蚕技术，使当地妇女都学会养蚕织机，“个个以丝布为衣”，可先进技术的传入，冲击了当地的木棉制衣业，她们遭到恶势力的围攻，幸得唐敖相救方能脱险。徐承志则“漂流数载，苦不堪言，甚至童仆之役，亦曾做过”，后来投军到淑士国，境遇虽有改善，“仍是度日如年”。……由于明清官府视海外华民为“叛民”、“异己”，他们在寓居国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根本得不到同情，更谈不上受到保护，而李汝珍能看到这些艰辛，并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可见

其海外发展思想的进步性和一定的民主意识。但是身处于那个封建闭塞的社会中,他显然又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只能在作品中安排他们最终都回到故土,重新过上传统的安居乐业的生活。

### 三、对中外关系的认识

就整体情况而言,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已发生的巨大变化基本上处于毫无所知的蒙昧状态,依然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1793年乾隆皇帝对来华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sup>①</sup>,与其说这是封建帝王虚骄自大的表现,不如说是网罩在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伟大的民族身上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它无形地制约和影响人们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和处理。

罗懋登的《西洋记》特别强调华夏正统观念,宣扬“有中国才有夷狄,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的观点。小说第八回写道:“自从天朝万岁爷登龙位之时,天无烈风暴雨,海不扬波,各各小邦知道中国有个圣人治世,故此贡些土产,恭贺天朝”,于是“有名有姓的番王,还有一等没名没姓的”都“一国挨着一国”争相进贡。而作者在浓墨重彩这幅“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太平盛景之余,还不忘丑化各国来使——“只见午门之内,跪着一班儿异样的人,原来不是我中朝文献之邦,略似人形而已……”<sup>②</sup>,自豪之情交织着藐视态度,流露出一种以“天朝上国”自居、视他国为“蛮夷”的自我优越感。

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中心使命,就是“抚夷取宝”。书中写他受命为“征西大元帅”,率领“宝船”千号,战将千员,声势浩大地出海,沿途诏谕各地,要求他们接受新的“正朔”,奉上降书降表和通关牒文。而出于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并叹服于郑和船队的威势,海外诸国大多诚惶诚恐,愿意“永作外藩,时输内贡”,还“矢心惟一,誓无二三”,于是双方言欢,各国进献贡品,郑和也回敬冠带、袍笏、靴袜、瓷器之类。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不愿归顺,对此,郑和除了调动一切力量予以坚决打击之外,还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训诫——他对金莲宝象国的三太子说:“今日天兵西下,只受得你父王一纸降书,你社稷如故,江山如故……”<sup>③</sup>,一席

话说得对方心服口服，打消了继续抵抗之心。爪哇国王负固不宾，郑和不受降书降表和礼单，命他书写供状，即时收拾，亲自朝贡天朝，求免死罪。锡兰国王无道又顽抗，郑和令人在他的琵琶骨穿过一条铁链，关进囚笼，又将斩得的敌将首级挂将起来，各竖一面白牌以示惩戒，这对别国也造成了极大的威慑。金眼国兵败求降，郑和申斥国王：“中国为首为冠，夷狄为足为履，岂有一个足敢加于首？岂有一个履敢加于冠？……似你这等倔强无礼，我就该灭你之国，绝你之祀，戮你之首，迁你之子孙”<sup>①</sup>。……总之，不论是礼善往来，还是兵戎相见，都是从“怀柔远人”的角度处理中外关系，一方面恩威并至，和为贵，另一方面“用夏变夷”，攻心为上，在追求“君主天下”的政治影响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天朝”、“大邦”的意识同样在李汝珍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不过他毕竟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对海外国家和人民基本上采取和平平等的态度，因此与《西洋记》的偏重用兵不同，《镜花缘》更乐于在交流中展示“上国”恩泽。

小说中，唐敖一行每到一个国家，总是以来自天朝为荣，颇为自负。那些沿途国家，也总是将他们视为天朝的化身，谦恭之极。女儿国上表给中国时自称为“臣”，国内事务期盼能由“天廷”帮助裁决。君子国崇拜中国，说自己国家治理得好，全是因为受到天朝感化。黑齿国的卢姓秀才与他的女弟子们，钻研音韵、考据，把个博学的多九公考问得大汗淋漓，可她们所习的都是汉学内容。另外，巫咸国的养桑织绸之技是由滞留海外的姚芷馨等人传授的，而唐敖一行也带去了生铁，带去了水利工程技术，带去了医药学知识，让中华文化传播异邦，“惠及四荒”。在贸易过程中，他们对大国小国都一视同仁，奉行公平交易原则，从不欺凌弱小，至于讨价还价则属于贸易中的正常现象。但是，作者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他看来，“忠恕之道”超越了一切经济利益，即便是海外贸易也要让位于“仁政”理念的推行，于是书中所写君子国的交易情景竟是买主争着要出高价、卖主却急于要贱卖，而在淑士国，林之洋还主动亏本做起了生意，这就违背了商业规律，和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



#### 四、海洋迷思的呈现

通过以上各个领域的探讨,我们看到,一方面,正如《西洋记》“自序”中所说的:“今日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罗懋登对万历年间严重的倭患极为关注和不安,对执政者在外患面前显得软弱无能深感不满,这使他缅怀历史上的航海英雄和“靖海”盛事,希望能够激励当局在海上有所作为,消除倭患,并以此为契机重振国威。而李汝珍面对清中叶政治、经济的沉闷现状,根据自己的听闻,从《山海经》里受到启发去展开想象的翅膀,海外那奇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既是国内社会的缩影,又寄托着他乌托邦似的向往。两人都是有意识地走出了国门,去向海洋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也正像上文所分析到的,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并且明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自居于万国之上的封建君权,在16—19世纪中叶的三四百年间,始终以一种闭关自守的心态来处理海洋事务,使辽阔的海洋真正成为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天然防线。一旦放眼海外,两人对海洋本质认识的困惑都集中得以彰显——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却苦于经历有限和地理知识的贫乏,只能重走荒诞传说和猎奇描写的老路;他们关注发展海上事业,却又坚守着农本思想,徘徊于“义”、“利”之间;他们期盼扩大中外交往,却时时在维持着“天朝上国”的骄矜与自尊,蒙蔽了可以洞见世界大势的理智之窗,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海洋迷思。

由于时代的原因,罗懋登和李汝珍所表现出来的海洋迷思又各有特点。在明代,明太祖的“开国禁海”作为既定国策被确立下来后,他的子孙们谨遵旧制,基本上都是以“禁海”为主要手段来对付日益活跃起来的外部世界。虽然这种情况在穆宗即位后开始有所改变,但也只不过是张弛交替之间略有变化而已。而明王朝实行垄断的朝贡贸易,严厉禁止私人海上贸易活动,除了在以大陆农业文明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下,思想上认定海上贸易是破坏封建王朝统治基础的不安定因素之外,终明一代,内外勾结的倭患造成海疆不靖的严重局势也成为统治者从海洋退缩的重要原因。有感于此,《西洋记》着力描写郑和打击海

上势力、安抚海外诸国的事迹，作者在重温前朝的壮举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天朝”情结十分严重，对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基本没有什么好感。清王朝所处的时代与明王朝大不相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性海洋时代的到来，西方世界对华贸易的愿望更加强烈，海上频繁叩关之声清晰可闻。尽管清朝承袭明朝的传统和思路实行禁海，但已有所变化。最初为了招抚郑成功海上势力，清廷统治者曾采取权宜之计允许海商出海贸易，随着郑氏海上抗清力量的壮大，又开始沿袭明代“禁海”政策的做法，采取大规模的禁海迁界行动来封杀郑氏政权的经济来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收复，朝廷下令有限度地重开海上贸易。同时，清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商品经济较为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比明代有所发展，沿海地区，特别是《镜花缘》中所写的岭南一带，发展就更为迅速。诸多因素使得李汝珍有机会认识到海洋与滨海之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并在进步的启蒙主义思潮启发下能较客观地对待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然而，身处以封闭保守为海洋政策总趋势的乾嘉年代，他毕竟没有机会窥见业已日新月异的世界大势，对于强国之路在哪里，如何和海外交流，不可能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因此描写的海外贸易有时显得不太真实，他也只能承继古人的浪漫思想，让唐敖隐逸成仙，连女儿唐小山也带着紫绶追随父亲去了。

不论是《西洋记》还是《镜花缘》所体现的海洋观念，放到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西洋记》生发并保留下明代许多关于郑和的传说和史料，呼吁能有像郑、王那样的将帅，威振海表，重整朝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思想情绪和愿望。《镜花缘》正视海外贸易现象的存在，并且跳出中国一个国家的视界，借海外游历传达了自己改良社会的想法，成为近代民主、开放意识的先声。而通过对二者海洋观念的比较，分析其海洋迷思的呈现与各自特点，又说明，疏远海洋就疏远了世界、疏远了未来，就难以根本改变衰微落后的局面，这是明清统治者海洋意识淡薄所付出的代价，更是我们面对当今海洋世纪的挑战很应该引以为戒的。

（下转第 235 页）

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杜元凯颜师古这些大儒专家，亦不能无失，并列举了王安石开始解《八月剥枣》为“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后来郊行遇到一百姓，问其翁安在，答曰：“去扑枣”，始悟“剥”“扑”也，即杜甫所谓“堂前扑枣任西邻”之意也。“始悟前非”，“具奏乞除去十三字”（前解）。该节又举了洪庆善、钱伸仲等所经之事，以说明注书难在溯源和正解，引书常为流而不为源，以至数典忘祖，解释常望文生意（义），以至差之千里。皆是语重心长之至论。

当然，一部《容斋随笔》既可说是治国做人之书，更可说是为学之书。虽然它并非逻辑严密的学术论著，后人甚至列入《笔记小说大观》视为小说。但就其内容而言，就其论述过程而言，实实在在是一部学问之书，与《菜根谭》正是相得益彰，宜其为广大读者所爱读，称之为“书苑双璧，常读常新。”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王长友

---

（上接第 179 页）

### 注：

① 石介《石徂徕集》，中华书局，1985 年出版。

② ③ ⑥ ⑦ ⑧ ⑫ ⑬ ⑭ 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 115 页，第 183 页，第 19 页，第 1286 页，第 443 页，第 105 页，第 304 页，第 87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出版。

④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中华书局，1993 年出版。

⑤ ⑨ 李汝珍《镜花缘》，第 65 页，第 23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出版。

⑩ 参见陈松喜《一部反映清代海外贸易的佳作——〈镜花缘〉》，《图书馆论坛》，2004 年第 4 期。

⑪ 《高宗纯皇帝实录》1435 卷，中华书局，1986 年出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长友